

文化模式——概念修辞格下的思考*

温州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 杨德生

摘要: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是语言建构的图式如何影响人们认知所在的社会和文化,所以修辞格的研究包括有效的语言表达功能解读和概念化模式功能的解读两个方面。传统修辞学关注语言表达效果,而概念修辞格主要从文化视角研究语言的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思维模式,阐释文本的概念化模式和文化特征。文化模式的概念修辞格探析,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大趋势下语言学诗学、现代文化批评和解构主义等的跨学科、多维度研究路径一致。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研究方法,文化的概念修辞格解读是通过反思整体,从宏观和开放的视角获得对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文化理论和文本更深入、全面和客观的理解,有助于更有效地认知我们所在的世界。

关键词:文化模式,概念修辞格,图式

作者简介:副教授,主要研究和综合应用教育学、语言学、修辞学、文化批评理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方法与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来改进英语教学效果。电子邮箱:wywywz@126.com

1 引言

修辞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文化的语言研究包括修辞的视角,而且文化的修辞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重要方面。文化的修辞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其中之一是从修辞格的角度切入。修辞格(下简称“辞格”)可定义为“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地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式”(王德春等,1987:27),即威尔士(Wales,1989:176-177)与李银芳和刘启成(2009:3—5)所定义的:在语言使用中就语音、语义或句法方面对常规偏离的修辞手段。辞格作为修辞活动具有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功能,“不少辞格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认知功能与语义功能”(李国南,2001:绪

论1),本文探析的正是作为人类文化普遍思维方式或认知手段的辞格在文化模式解读方面的功能。不同于以词汇和句子为例的辞格认知功能研究(李国南,2001:绪论2;胡壮麟,2011:135—142),本文主要以语篇/文本为例探讨辞格对文化的整体或系统思维过程之解读作用,探索的是理夫金和瑞安(Rivkin & Ryan)所编著的《20世纪文论》(*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中,在阐释、比较和总结这一重要文学和文化研究发展时期的理论时所提出的现代修辞学家特别关注的研究方面:“镶嵌在语言中的图式是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我们认知世界的”(2004:128)。下文按照刘畅(2013:24—28)的修辞功能两分法:语言修辞和内容修辞,首先讨论和比较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为主的辞格的功能,即辞格的语言修辞研究,和以语言所传递的信息、思想内容为主的辞格功能,即辞格的思想修辞研究。

2 修辞格的语言修辞功能与思想修辞功能

辞格的语言修辞指偏离于常规的表达形式,若使用得当,可以用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这是修辞学传统研究的范畴。这样的修辞功能常由具体的语言形式显性地表现,即通过语音、词汇或句型手段等实现,如由音韵、节奏和旋律表现的音乐美,由对照、排比、反复等表现的形式美,由比喻、拟人、通感等表现的联想美等(韩虎林,1996:1—7)。再如,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1916)提倡的“陌生化”技巧(De-familiarization),辞格也是其用于实现文学语言表达创新性的常用手段(Rivkin & Ryan,2004:15—20)。

而且,语篇不仅可以在其组成部分使用辞格,利用语言成分的音韵和结构形式有效组合“出新出彩”带来美感效应,在具体的语境下,还可以在全文都用变异的修辞方式表达,这样的语言表达方法称为语篇变模修辞,是通过采用与语篇常规的衔接、连贯和建模相反或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实现,如全部是问句构成的语篇、全部由“是字句”组成的语篇,特定节律组成的语篇等(许钟宁,2007:43—47)。

因此,辞格的语言功能是通过有形的语言形式显性地展示英语修辞的基本美质,而辞格的思想内容修辞则不同,主要是借助拓展和延伸辞格的概念把隐性的文化特征或文化思维模式等显性化,是通过这样概念化的辞格揭示人类思维认知的系统性,如对隐喻的概念化研究(束定芳,2000;李国南,2001;魏纪东,2009)和转喻思维对寓言故事的语篇建构模式生成功能(刘宏伟,2012:16—

19),是目前从文化思维的宏观视角探索较多的辞格,尤其是比喻,因为各种辞格被认为是比喻的变体,所以“……修辞学就是广义的比喻研究”(赵毅衡,2010:110)。而且由于修辞学有这样强的指涉变异功能,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把语言修辞学的修辞潜在性同文学本身等同,并声称自己“能找出许多文学等同于辞格的先例”(转引自赵奎英,2010:107)。

正因为辞格具备这样强大的思想修辞功能,即能系统、完整地表达某一思想,因此被用作文化模式的解读方法。如果把比喻辞格延伸到思想层面形成一种整体思考、一种系统的思想来分析“角色理论”和分析钱锺书的《围城》,无论是来源于舞台用语的“角色”还是家庭的“婚姻”比喻,都不是仅仅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和为讲清楚某个片段语义而用这样的修辞手段了,这两个语境使用比喻辞格是超出了语言修辞层面进入到社会、人生、事业等系统思考中,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范式,这样的概念隐喻,尽管是来源于语言层面,却又高于语言层面,是从简单的比喻用法拓展到整体构思、哲理思考和谋篇布局的思想层面(刘畅,2013:28—29)。

3 文化模式的概念修辞格解读

因为辞格的延伸和拓展具有思想内容修辞功能,能系统地显性化原本隐性的文化图式/模式或文本思想内容的整体面貌,这样使用的辞格在本文中称为“概念修辞格”(下简称“概念辞格”)。上文是用同一个概念辞格,即概念隐喻来阐释不同文本的谋篇布局、现实生活和社会文化深意。此外,还可用不同的概念辞格来解读相同的或同一个文化模式。

首先看如何用不同的概念辞格解读哲学文化模式。按照西方哲学传统可分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在比较哲学的这两个文化时,克里奇利(Critchley)先后分别用了悖论(Paradox)和一对概念隐喻(Metaphor):悖论是指如果认知世界时完全忽视分析哲学视角,就会使人处于蒙昧状态,反之,如果只从欧陆哲学观把握世界,人就会变成疯子(Critchley,2009:6-11,155-160)。一对概念隐喻分别把英美分析哲学比作解决问题的眼镜,把欧陆哲学比为解决问题的眼睛。这两个概念辞格原本是修辞手段,“Paradox”称作“反论/隗语”,是“把两个相反的概念组合在一个句子中”,表面上两个概念不合常理、自相矛盾。这样表面意义似是而非,实际上寓意深刻的辞格引人深思,常被用来讲道理、论观点或揭示立身处世的道理(李银芳、刘启成,2009:212)。隐喻指“直接把甲事物当作乙事

物来描写”，也是在文学、日常生活中中广为使用的辞格（李银芳、刘启成，2009：15）。但克里奇利使用这两种辞格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是用作两种概念框架以便从宏观的哲学和学理层来比较两大哲学理论，即用悖论和比喻比较两个哲学派别重要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分析学派是传统理性思维的代表，是以逻辑为其主要工具（眼镜），探求事物的“真”，而欧陆哲学以人类主体的感知为出发点，把对实践活动、事件或文本意义的理解置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重构它在历史上的出现。作者想说明的是这两个哲学体系各有所长，一个帮助人类探寻真理，一个帮助人类认知智慧，因此既需要观察的眼镜（分析哲学的批判和逻辑的解构），也需要看待事物的眼睛（阐释学的重建），哲学中的这两种文化解读模式不过是更大文化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罢了（同上，2009：32—53，180—199）。所以，用悖论和隐喻，用大家熟悉、具体的事物，不是只谈及片段的语义，而是两种看问题的整体视角，是从思想内容体系层面类比说明抽象的哲学概念和学科范式，从而批评把哲学中的两种文化解读模式对立起来和任意割裂、“有他无我”的哲学观和做法。

同理，在文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领域中，辞格的拓展和延伸也为通过分析文学文本来解读文化模式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认知方法或把握文体思想修辞的途径。文学题材、体裁广泛，用于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很多，下文从理夫金和瑞安对所选编的2004版《20世纪文论》中选择三篇对诗歌进行概念辞格解读的文章进行分析。先简单说明两种辞格的语言修辞功能（下文涉及四个辞格，其中的悖论和隐喻，前文已定义，此处不再赘述），然后说明这四种概念辞格是如何通过解读文学的典型文体诗歌来阐释文化模式的。

矛盾/反义辞格（Oxymoron）是“把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词或词组放在一起构成的一个修辞格”，旨在揭示两事物互相矛盾的性质，突出事物特点（同上，2009：222）。尽管矛盾辞格和反论都是用矛盾反常的表达，以取得出人意外、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但从构成上，矛盾修辞是词义辞格，是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放置在一起，前一个修饰限定后一个；而反论是结构辞格，是把两个相反概念组合在一个句子中，两个概念不是放置在一起或对称放置。从使用目的看，矛盾辞格强调主次两个部分的统一，而反论突显前后两个意义相反的概念似是而非，故意说得似非而可能是的反常表述（同上，2009：214）。

转喻（Metonymy）是用一个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个事物名称，两事物有某种密切联系，但无相似处，是依靠后者与前者密切关联性和联想来取代前者（同上，2009：183—184）。转喻和比喻一样是常用的辞格，但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喻意义依靠的是相似性，在某一点上两种事物可相互取代，而转喻意义却是邻

接关系,是一种指示性或组合性关系。

首先例释由反论辞格(Paradox)延伸发展出的文学术语“悖论”,该术语出自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代表人物布鲁克斯(Brooks)1947年的著作《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Well Wrought Urn: Studies of Structure of Poetry*)所选章节“悖论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在这部分选段中,作者把诗歌语言看作悖论语言,是从悖论情景中获得力量,真理来源于悖论,以及作为诗歌基础的悖论赋予诗歌以一些特征;艺术是采用间接而非直接方式表现,作为艺术的诗歌依靠类比通过比喻传情达义,但是不同比喻不可能一一完全对应所表信息,必然产生重合、差别和矛盾,这是诗歌产生悖论的根源(Rivkin & Ryan, 2004: 28-39)。在此作者实际上是陈述了诗歌的悖论解读的路径、理据、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并具体例释,提出的是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解读模式(乔国强、薛春霞, 2011: 106—108),不是传统辞格概念所能包含的。

第二个例子还是选自新批评派另一个代表人物维姆萨特(Wimsatt, 1954)所著《言语的符号》(*The Verbal Icon*)中的章节“具体的普遍性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ncrete Universal),所涉及的是由反义/矛盾辞格所拓展出来的文学术语“具体的普遍性”。作者在选段中提出两种普遍性:分类/逻辑的普遍性,这是更普适的普遍性,更具体、能更好地反映事物本质的普遍性,作者认为文学作品能比其他写作形式更有效地把个性化和普遍性结合,因为如果所用的词语是直接描写就是一种概括,这是词汇的本质,所以具体和普遍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认为判断诗歌是以具体还是分类逻辑普遍性为特征是由诗歌的细节、细节的使用方法以及细节的安排来决定的,应该用细节传递信息,好的诗歌能进行多重解读,是形式多样化艺术的统一,即“具体的普遍性”,诗歌的具体的普遍性结构包括形式结构方面和内容价值方面等(Rivkin & Ryan, 2004: 40—49)。作为本章标题部分的矛盾辞格“具体的普遍性”与作为文学解读方法的“具体的普遍性”虽包含在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中,但两者所代表的思想内容和传递的信息方面差异很大,后者论及的是文学批评的方法,其涉及的丰富思想内容,如内涵和外延研究与具体性和普遍性研究的联系与简史、普遍性的种类、普遍性与具体性的关系、具体普遍性的定义等是文学解读图式,远非矛盾辞格的概念所能概括,因为作为文学术语的具体普遍性指称的是一种文学批评模式。

最后选段是形式主义(Formalism)代表人物,莫斯科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Jakobson)1956年发表的《语言的两个方面》(*Two Aspects of Language*),这篇选段用比喻和转喻辞格所发展延伸的两类概念辞格来比较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影响的作者认为语篇是按照两种语义模

式发展,即当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转移时,话题转移的方式,要么是通过类似性作为连接方法推进主题,要么是通过邻接性推进话题,前者就是概念隐喻方法,后者是概念转喻方法。其实,这样的区分源于索氏语义层的纵聚合和横组合关系的分类,作者把这对语义关系用于分析语篇层语义关系延伸为语篇发展模式,用来区分文体,以此为基础区分诗歌和散文,如他认为诗歌是符号,具有相似性和比喻性特点,通过模仿和同一性产生语篇联系,比喻与浪漫主义的紧密关系是大家熟知的事实;而散文是指称词,具有邻接性、转喻特点,通过邻接性产生联想,但散文与现实主义同样有密切关系的情况却常被大家忽略(Rivkin & Ryan, 2004: 76—79)。实际上,隐喻和转喻的这种概念化功能不仅在语言修辞和认知语言学领域被广为研究,而且也开始进入非语言符号,尤其是图像修辞研究中,如用于影视、表演、比赛、运动、广告等媒介的文化模式解读研究中(赵毅衡, 2010: 110)。

总之,以上三例所涉及的悖论、矛盾、隐喻和转喻,原本是传统修辞学中的四个辞格,在一定的语篇语境中可用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和突显修辞目的,一般对语篇的部分语义起到增光添彩的语用效果,但在以上文本中分别被新批评派和形式主义借用来对诗歌进行分析解读,通过引申发展后,从纯语言功能上升到表现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结构原则或诗歌内部的辩证结构。这三个文本各有侧重地从语言表达特点、语言描写细节普遍性的程度和语篇组织结构方式三个视角切入分析同一种文学体裁,概述诗歌的宏观建构和解读的文化思维模式,是从辞格的语言修辞层面上升到思想内容以及方法论的系统化分析的广度和深度。

以上主要例释了一些文化模式的概念辞格解读方法和不同模式的不同解读方法的区别,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可以进行这样的文化模式解读?有何文化、文学理论依据?如何看待这类文化模式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4 文化模式解读的理据和意义

辞格的研究表明,既可以从语言修辞方面也能从思想内容层展开,同时能用同一个概念化辞格解读不同的文化现象或文本、文学题材和体裁,和用不同的概念化辞格解读相同的文化现象或文本、文学题材和体裁。下文依次回答:为何可以这样研究文化和为何应该这样研究文化。

4.1 文化模式解读的理据

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现代语言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知识基础,并参与其研究范式的建构。根据语言学视角的文论观,文学和文本是语言建构的产物,语言词语的多义性本质特点导致意义解读的歧义性、含混性,没有一对一的语义与语形关系,所以意义不是事先就存在或固化的。这样的差异性决定和产生意义,决定了意义的相对性,意义须在具体的语境和上下文关系中确定(周宪,2010: 99—103)。简言之,语言的多义性、意义相对性以及意义解读语境性等特点,为同一文本的多种文化模式解读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本项研究的理据之一。

美国批评家费希(Fish, 1976)在其“解释的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中把意义的创生归于解释群体(指的是为了写作分享解释策略的人们)所共享的解释策略(即本文所论的文化解读模式,简称文化模式),并认为这些策略先于阅读活动而存在(Rivkin & Ryan, 2004: 271—221)。所以,如果读者对文本有相同解读,是因为同一解释群体的成员相同的解释策略使他们阅读到的一切与群体的既定目标相关;但如果读者对文本有不同的解释,是因为不同解释群体解释策略不同,自然意见相左。简言之,即如艾布拉姆斯(Abrams)(2004: 259)和费希(2004: 271—221)所言的:是读者所属的解释群体身份决定了意义。同理,从费希的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观可以推知,文论或文化批评家也是根据所占有的解释策略或文化模式解读文本,他们既可用相同概念辞格策略/文化模式解读不同的文本、文化现象和问题,所属不同解释群体的文论或文化批评家也可用不同的概念辞格策略/文化模式解读相同的文本。

根据篇际性/互文性观(Intertextuality),德·博加德(de Beaugrand)和德雷斯勒(Dressler)(1981)认为“每一个篇章都是对其他篇章吸收和转化的结果”(转引自刘辰诞、赵秀凤,2011: 104),换言之,“当前的篇章以先前的篇章作为篇章生成的语境因素之一,而本身又将作为以后篇章生成的一种语境因素”(同上),所以,根据篇际性标准,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参照以前篇章,读者则应使用以前的篇章知识解读目前的篇章。篇章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使我们能用相同的概念辞格方法解读不同文本、文化现象。再从研究的方法论视角,不同的概念化辞格可解读相同文本、文化现象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即新的研究发现总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所以,解读同一个研究问题的不同文学批评理论之间必然存在着学理的联系,同时因为问题的研究是动态、发展的,尤其是文化问题,是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等变化的,将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对老问题也会有新

的解读方式,所以用不同的概念辞格解读相同的文本或文学题材、体裁反映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即科学总是在探索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相同的研究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最后,从广义的概念比喻理论和认知语言学视角看,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手段是比喻思维,而作为比喻变体的各种辞格自然都具有这样概念化思维的潜在属性。此外,所有辞格都具有相同的预设语境:类推(Analogy),即所有辞格是类推的缩写(赵毅衡,2010:114),这样的相同语境基础是不同概念辞格具备相同或至少类似的系统化思想修辞功能的重要前提条件。除了已经使用比较多的概念辞格,如隐喻、转喻、反论等外,我们认为其他的辞格也可能进行类似的拓展和研究,而且认为概念辞格的解读方法代表了一种文学与文化研究模式,因为语言系统表达意思、传递信息的交际功能运作机制,德里达(Derrida)(1968b)认为,无论是用口语还是书面语形式,都不是直接和意义或信息发生联系的,而是通过一个符号指向或指称另外的符号来实现的(Rivkin & Ryan, 2004: 337—338),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体系其本质就是一个潜在、隐性的概念辞格系统,概念辞格及其用法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一类显性化表征模式或内部结构,而概念辞格分析就是认知语言这个隐性概念辞格大系统的一种研究模式,当然可能还存在更多其他的研究路径,不过就文化的概念辞格解读模式到目前为止的探研情况看,无论是以研究数量、内容还是分析的研究问题、方法等为标准,与传统修辞格的种类比较,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所以如果对其他更多的辞格进行概念化延伸和拓展,建构更多文学和文化分析模式,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新的视角来认知我们熟悉的、但却可能“熟视无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问题。

4.2 文化模式解读的必要性和意义

辞格解读文本和文化,有微观语言修辞和宏观思想内容修辞的分析,本文第二部分阐释了两种分析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用不同文化模式分析有助于对文化问题、文化现象和文体有更好的把握;而且用不同概念辞格从不同角度解读文化,即用发散思维和多角度思维方式看问题,这样的能力与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进行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前提条件,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更客观和全面地进行文化批评实践。同时,概念辞格解读路径也符合现代文化批评、后现代修辞语言观和解构主义等开放、多元、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从本质上讲也是探索人类如何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研究的方法论视角看,现代文化的解读模式在研究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时,是从多角度和综合方式研究生产文本和生活中的文化,并透过对文化表征的分析发现社会文化结构背后的支撑点:是根据何种观念看待和分析文本的,是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对社会文化的现象做整体把握(王晓路,2011:10—11)。从认识论层看,后现代修辞语言观认为修辞性、隐喻存在于一切文本内部,由于隐喻具有意义模糊性、含混性,破坏和解构了清晰的逻辑和语法,所以任何一种知识或语言都无法真正做到清晰(赵奎英,2010:106,108),就需要通过不同角度认知才可能比较客观、全面地把握事物和文化现象的本质。再从研究范围和对象看,现代“语言文化诗学”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等人类的整个文化(同上,2010:108—109),在这样宏大的视野下进行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实践,自然是跨学科和多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模式或范式正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德里达(1967,1968a,1968b)所倡导的。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在肯定生命的大前提下怀疑现存的伦理秩序和观点,批评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唯一”,解构二元对立的束缚以解放人性中的其他功能(童明,2012:112—113)。解构是在逻各斯结构/体系内通过“自由游戏”的艺术使这个结构变成开放话语,用思辨方式走向民主。解构逻各斯中心是因为它是一个排斥他者的逻辑;而且解构分析和思辨须不断进行,因为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会随时空变化不断以新的形式重建、重现(Rivkin & Ryan,2004:294,311,317,335—337;童明,2012:91,100—102,113—114)。

解构依靠修辞,因为释放能指的能量有助于消解逻各斯体系的超念所指:“语言文字”就是事物本身,就是思想和真实以及二元对立所建立的逻各斯中心(Rivkin & Ryan,2004:282,302,310,313—314,317,333)。所以解构主张的不是索绪尔提出的能指—所指的顺序,而是所指—能指的上下顺序,即康德所言的“所指不断地在能指上下滑动”(转引自童明,2012:102),这样显性化语言模糊性旨在反对二元对立中实质、逻辑、真理和言说等“在场”的唯一正确性和权威地位,从而还原事物的各种含义和价值等,但这样的文本、文化模式解读绝不是否定语义的存在,能指和所指在特定的语境下是有联系的、有语义的(童明,2012:102)。

解构观认为不同读者对文本的整体持不同看法,解构就是阐释符号概念、文本理论以说明表达语意和解读因时空间隔等产生的“延异性”,解构的不仅是文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和假设等进行严肃的批评(Rivkin & Ryan,2004:279,284—287,306;童明,2012:109)。所以,解构的阅读式就是按照阅读—写作—观察(批评)方式进行的。因此现代文本分析实践就是综

合文字、文化、历史、心理等各种分析的多面和多学科的分析,这样的解构者就是“写作的读者和阅读的作者,观察者和批评者”(童明,2012: 92,108,118)。

其实,文本互文性、解释的群体、德里达的解构观和文化的概念辞格解读等文化模式解读路径,根据新学习理论,都是“专家级”的解读模式。根据建构主义观,波斯纳(Posner)(1895: 119—120)和索耶(R. Keith Sawyer)(2010: 12,45)认为人是依靠原有的知识学习新知识和认知世界的,新学习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原有知识类型中最有效的是专家的专业知识,因为,尽管所在学科的专业知识各不相同,但专家们的知识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全面、深刻理解专业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语境化、模式化的知识结构体系或图式(hierarchical framework or schema)。由于具备了这样的知识结构体系,布兰斯福德(Bransford)等认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专家们能用多维、灵活的方法处理,能轻松自如地提取相关的重要知识解决问题,能综观事物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能就事物、现象和问题等辨识常人所无法观察到的特点和模式等共同特点(Bransford *et al.*, 2000: 31—50; 杨玉琴、蔡永, 2011: 26; 杨南昌等, 2011: 20; 任英杰、徐晓东, 2012: 29)。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新学习理论的重要启示是:要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效能,就应该学习、理解和应用这样模式化、程序化和语境化的层级框架知识或系统化知识网络或图式。所以,我们对概念辞格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就是在了解专家们如何进行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的;了解和掌握这样的文化研究模式、分析方法,进而在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中使用,就是借专家的“慧眼”帮助我们洞悉文化表象下潜藏的特点、模式和规律,进而去触及巴特(Barthes)(1957)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1981)所指的文化表象背后的价值观与动机(Rivkin & Ryan, 2004: 81-89, 365-376),来避免出现芒斯(Munns)和兰贾(Rajan)所编著的《文化研究:历史、理论和实践》(*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中文化批评家麦克卢汉(McLuhan)(1964)、约翰逊(Johnson)(1983)和费斯克(Fiske)(1990)所警示的情况发生:被现代高科技以及各种媒体手段所包装的信息所左右和蒙蔽而成为其宣传狭隘权力权威、意识形态和消费价值观的奴仆或受害者(Munns & Rajan, 1995: 226-235, 598, 1274-1284)。通过这样向专家们不断地“借慧眼”,即通过学习、模仿和实践过程来达到“透过对文化表征的分析,见出文化、知识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王晓路, 2011: 10);只有这样有意识地学用这类文化模式和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文化批评能力,进而探索新的认知视角和新的文化模式,才能有效地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生活、文化等领域的挑战。

5 结语

概念辞格,作为一种文化解读模式,无论是从语言修辞功能角度探索修辞和辞格的美学功能、语篇变模方式,还是从概念辞格的思想内容修辞功能视角分析文化现象、文化理论和问题与文本,都可以超越在孤立的词义、语音和句子结构层面对只言片语意义进行分析的传统修辞研究方法,都可以从更高的认知层,从语篇层面、互文性、读者与作品关系等宏观层,并与哲学、社会等相结合进行文化研究。诚然,辞格的语言修辞研究和文化的概念辞格解读都是来源于辞格语言所承载的概念,而且语言形式修辞和其思想内容修辞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语言应用中紧密相连,但把辞格的思想内容修辞分出专门研讨,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文化解读路径,同时也让我们从反思整体中获得对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文化理论和文本的理解,从而引向更深入、更全面和更客观的理解。本文提出了概念辞格是一种文化研究模式,甚至可以进一步界定为一种文化研究范式,对一些常用概念辞格进行了定性分析,初探了这种研究路径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的理据和意义等,有待未来用定量方法和更丰富的语料分析,用更为详实有力的证据进一步揭示、界定和论证概念辞格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范式的研究问题、方向、手段、过程 and 标准等,探寻新的文化分析方法和视角,以最终服务于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其所在世界的目标。

注释

* 本文为浙江省 2013 年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说写领先、重在应用’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项目编号:kg2013563)、2012 年温州医学院校级课堂教学改革课题:“外语教学模式比较的中国研究:英语专业知识性与技能性课程的有效教学探析”(项目编号:YB2012054)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Abrams, M. H. 2004.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arthes, R. 1957. Mythologies.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81-89.
- 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365-377.

- Bransford, J. D., A. L. Brown, & R. R. Cocking. 2000. *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 (expanded e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Brooks, C. 1947. The language of paradox.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28-39.
- Critchley, S. 2009.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Jiang Yi,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149, 151-272.
- Derrida, J. 1967. Of grammatology.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300-331.
- 1968a. Differance.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278-299.
- 1968b. Semiology and grammatology.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332-339.
- Fish, S. 1976.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217-221.
- Fiske, J. 1990. Television culture.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1274-1284.
- Jakobson, R. 1956.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76-80.
- Johnson, R. 1983.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In J. Munns & G. Rajan (ed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ngland: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5: 574-612.
- Mcluhan, M. 1964.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In J. Munns, & G. Rajan (ed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ngland: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5: 225-235.
- Posner, G. J. 1985. *Field Experience: A Guide to Reflective Teaching*. Broadway, NY: Longman, Inc..
- Rivkin, J. & M. Ryan. 2004.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action.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127-130.
- Shklovsky, V. 1916. Art as technique.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15-21.
- Wales, K. 1989. *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England: Longman Group UK Ltd..
- Wimsatt, W. K. Jr.. 1954.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crete universal. In J. Rivkin & M.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nd e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40-49.

- 韩虎林, 1996, 美学视野中的英语修辞, 《外语研究》(1): 1—7。
- 胡壮麟, 2011, 《语言学教程》(第4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国南, 2001, 《修辞格与词汇》,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李银芳、刘启成, 2009, 《英语修辞格浅论(上册)》, 吉林大学出版社。
- 刘畅, 2013, 语言修辞与思想修辞, 《贵州社会科学》(1): 24—31。
- 刘辰诞、赵秀凤, 2011, 《什么是篇章语言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刘宏伟, 2012, 转喻与寓言故事格局, 《外语与外语教学》(4): 16—19。
- 乔国强、薛春霞, 2011, 《什么是新批评》,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任英杰、徐晓东, 2012, 学习科学的重要问题及其方法论, 《远程教育杂志》(1): 26—36。
- R·基思·索耶, 2010, 《剑桥学习科学手册》(徐晓东等译), 北京: 科学教育出版社。
- 束定芳, 2000, 《隐喻学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董明, 2012, 西方文论关键词: 解构(上/下篇), 《外国文学》(5): 90—119。
- 王德春(主编), 1987, 《修辞学词典》,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王晓路, 2011, 文化批评: 为何与何为, 《文艺批评研究》(3): 8—13。
- 魏纪东, 2009, 《篇章隐喻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许钟宁, 2007, 语篇变模修辞, 《修辞学习》(5): 43—47。
- 杨南昌、刘晓艳、曾玉萍、李晶, 2011, 学习科学的方法论革新与研究方法综述, 《开放教育研究》(6): 20—29。
- 杨玉琴、蔡永, 2011, 强健式学习研究新进展, 《开放教育研究》(3): 22—33。
- 赵奎英, 2010, 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与语言文化诗学, 《学术月刊》(9): 104—109。
- 赵毅衡, 2010, 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 符号修辞, 《学术月刊》(9): 109—115。
- 周宪, 2010, “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从语言学转向看当代文论范式的建构, 《学术月刊》(9): 99—104。